

蒋经国为何解散台“反统战”组织

■ 吴建国(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原校长)

1978年12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从1979年元旦开始,美国政府决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建立与大陆的全面正式外交关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新政策。

蒋经国立即成立“反统战”组织

面对大陆新的对台政策与新的做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坚定地将大陆一切的作为，定位为“对台统战”，快速地采取了反制的行动。

就在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第6天，蒋经国召见了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的楚崧秋先生，要他负责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命名为“固国小组”。

蒋经国对大陆和平统战攻势的戒慎恐惧是事出有因。1948年他亲自坐镇上海，协助政府顺利发行金圆券,实施经济管制“打老虎”，却全面挫败，最后目睹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败亡。这一经历使他深切认识到不能严守中共统战的后果，只要政府态度稍一松动，台湾人心随之懈怠，一发不可收拾,结果不言而喻。1980年1月29日,蒋经国召见

从“王复国办公室”到“刘少康办公室”

王昇与蒋彥士商量的结果,决定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之下,设立一个隐秘性的小型幕僚单位,称为“王复国办公室”，于1980年4月1日成立,人事极为精简,皆由党政相关单位选调而来的优秀人才组成，每周集会商讨各项反统战工作的推动计划。

“王复国办公室”对于大陆对台统战的情报,随时予以掌握,所有作业，皆是针对中共的策略研拟反制对策。因工作需要,“王复国办公室”成立基地、海外、大陆三个工作研究委员会，每周集会商讨各项反统战工作计划。凡是由“王复国办公室”所提的重要拟案与建议，须经三次以上反复研议，签请蒋彥士秘书长转呈蒋经国核示许可后，再由蒋秘书长协调党政相关单位贯彻执行。

在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蒋彥士与“总统府秘书长”的马纪壮三位重要干部的精诚合作下，此一期间被认为是国民党党政运作、协调、指挥最灵活、最顺畅的一个黄金时期。“王复国办公室”在成立了一年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上将，对他说：“目前反统战的工作非常重要,从现在起由你负责！”

王昇从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行政专员时，就开始追随蒋经国,极受蒋经国倚重。在台湾长期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战系统”，被称为台湾的“政战教父”。但是唯独这次蒋经国要他负责对中共的反统战工作，他感觉责任太大,又是政治性极高、极度敏感的工作，因此他请蒋经国重新考虑人选,但是蒋经国十分坚持,王昇只有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工作。

不过,王昇要求“这个反统战小组所有的工作，仍应经由中央党部蒋彥士秘书长向主席报告与请示”。蒋经国同意了。就这样,国民党的反统战单位,由人力、物力都十分充实的政战系统接手，展开对大陆统战强力的反击。

以后,为了保密,正式更名为“刘少康办公室”,取自历史上“少康中兴”的典故。

曾担任“王复国办公室”海外研究委员会召集人的钱复曾在回忆录中说:在二年半中,举行了59次会议,大约每两周举行一次,都是周一中午在“外交部”内举行便当会议。我们研拟若干案件，也有几件立即付诸施行。

曾担任“王复国办公室”办公室行政秘书的汪振堂所撰写的《揭开刘少康办公室面纱》则认为“刘少康办公室”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项:一、扭转了反统战的劣势(特别在海外及基地两方面);二、迅速正确判断情况，立即策订行动计划;三、结合三个战场(台湾岛内、海外、大陆),发挥统合力。

总之,在成立“刘少康办公室”，进行对中共反统战的时候，蒋经国基本期盼这个单位要达成的任务，应该不外以上所述的三项。

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少康办公室”竟然成为台北政坛许多人的眼中钉。

成为“太上中常会”惹众怒

笔者曾访问担任“刘少康办公室”计划秘书的李在方,谈起35年前的往事,李在方仍有许多感慨,有不胜唏嘘之叹。

陈祖耀在他所著《王昇的一生》书中，也曾记录了李在方当时还特别找过他，希望能提醒王昇注意外界这样极为不利的反应。连资深的“刘少康办公室”大陆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也曾劝王昇要多向蒋经国做说明，避免这些外界的批评与攻击在政治上发酵，最后不可收拾。

但是，王昇总觉得他做事完全坦荡无私,对蒋经国绝对效忠,无需刻意去做说明与解释。况且台北政坛闲言闲语、是非恩怨的风气,一向盛行。如果顾虑太多，根本做不了事。因此,他并不在意这些批评与攻击，仍然主动地去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甚至会惹怒别人的事。

这种情形,李在方看在眼里,不禁要为王昇叫屈:“王昇虽然常年在政界任要职，可是有时却缺乏防人之心,甚至令人摆布,实在冤枉。”此外，也有不少部会首长看到

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蒋经国下令裁撤

对于“刘少康办公室”扩权与擅权的一个具体事证,就是曾任“教育部长”、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的李焕，在退休后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提到以下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3年的年初,当时我还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有一天接到“教育部长”朱汇森的电话,希望我到台北去与他见面。

结果见面后,朱拿出一份“刘少康办公室”的公文,内容是要求“教育部”比照军中实施“莒光日”给全体官兵上政治课的做法，在全台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每周都要上政治教育课程。

朱汇森明白表示“教育部”做不到,也不敢做,想想看要让大学教授乖乖地来上政治课，那不闹翻天了吗？

依据上述的例子,明显看出,由于“刘少康办公室”的扩权与擅权,影响其他各单位的职权甚大，最后成为众矢之的目标，有权的人纷纷在蒋经国面前告御状，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注定“刘少康办公室”难逃被裁撤的命运。而这个“学术讨论会”或是在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推行“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计划,引起诸多的反弹,并惹火了蒋经国,终于成为推倒“刘少康办公室”最后的一根稻草。

（据《世纪》）

从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到埃及的

加力、加纳的安南、韩国的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一般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世界各大洲都有份,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规矩”是中国创立的，它源于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选举。

中国临时更改投票策略

从联合国成立直到1981年,共产生过4位秘书长。他们是挪威的赖伊、瑞典的哈马舍尔德、缅甸的吴丹、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其中,缅甸的吴丹是因为哈马舍尔德飞机失事身亡,以副秘书长资格先担任代理秘书长而后转正的。由此可见,秘书长这个职位,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发达小国占据着。35年间,他们占了24年;4任人中,他们占了3个。

1981年，已担任两届秘书长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大使瓦尔海德姆宣布竞选连任秘书长。

这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一职务不应总是由欧洲人担任。

萨利姆是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候选人,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干的非洲政治家，在非洲国家中威信很高,而且对中国十分友好。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时候,萨利姆高兴得在会场带头跳舞。

1981年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期日益临近,我们是不是应该援引过去的惯例,对发达国家竞选人先投两次反对票,再转而投赞成票？

对此,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考虑了很久,下不了决心。但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中,中国必须及时表态,没有时间拖,而中国的一票又很有分量,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都在看着中国怎样做。

经过反复衡量,凌青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竞选人之一的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重要人物。他此次出来竞选不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代表整个非洲。

毛泽东曾经说过,是非洲国家把我们送进联合国的,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再说,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已连续三届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屡屡竞选失败,难道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说话,恐怕也不得人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为一个对我们自己没有多大利害关系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和美国对着干一次？

很明显,美国是支持瓦尔德海姆反对萨利姆的，其他国家倒无所谓。对这个问题，凌青自己没有什么把握,但风闻当时正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进行紧张谈判的时候,而谈判进展又并不顺利,我们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将大使馆级别重新降到联络处,因此,这时同美国闹点矛盾,似乎也并无不可。

基于以上认识，凌青就大胆设想:此次似乎可以反对到底，至少逼出第三人来竞选,而此人一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就很有利。

凌青把自己的想法在代表团党委会上提出，有些同志有点迟疑,但没有反对。凌青就给外交部写了报告,后来,外交部终于批准了,还具体指示对各个竞选人应当如何投票。

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一否到

底”的指示。这样,中国的投票态度就定下来了。

中美“角力”势均力敌

投票的日子到来了。1981年10月27日上午，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1轮投票开始举行。

凌青和梁于藩副代表准时入场。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西班牙代表德皮涅斯大使稍作说明后,投票便正式开始。

拿到选票后,凌青和身旁的梁于藩略作商议后即按预定方案投票:赞成对萨利姆的提名而反对瓦尔德海姆。

第1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利姆得11票，但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瓦尔德海姆得10票,与萨利姆一样，也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因为推荐秘书长人选的程序是不记名投票,无法得知是哪个常任理事国投的,但是不言而喻,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在之后的3轮投票中,瓦尔德海姆得票大多与前次持平,而萨利姆得票渐渐趋少。

第5、6轮投票在第二天举行,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次得票均为8票和11票。由于中国再度否决,瓦尔德海姆未能“过关”。一个星期后,举行了第7、8轮投票,萨利姆分别获9票和8票,由于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提名都未获通过。

11月17日,安理会连续举行了8次投票。但萨、瓦两人依旧吃“红牌”,美国和中国分别投了反对票。中国人下了决心,提名进入了僵局。长达20天的马拉松式投票对中国人的考验越来越严峻。

毛泽东的健身方法

■ 游和平

相隔不远。两人都喜欢在大风大雨中爬山。

他们从山下的爱晚亭爬上山顶的云麓宫，又从云麓宫走回爱晚亭,既不张伞,也不戴笠,让雨水淋透全身。常常就穿着一身湿透的衣服走到半学斋或周家台子畅谈一会儿,才回到自己住处。

有时候,毛泽东还喜欢在爱晚亭露宿。天黑以后,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携着小小的篾席子，一路走到亭子上,乘凉闲话，一直到夜深人静时。

最初曾流传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萨利姆提名无望通过后会相机行事,转而放弃支持,使瓦尔德海姆“柳暗花明”。

在经过16轮投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不仅美国人反对萨利姆是铁了心,不遗余力,中国这一回否决瓦尔德海姆也是动了真格,坚定不移。

从一开始，中国的立场就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赞扬。他们纷纷对凌青表示:中国“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事业，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的真正朋友”。中国的坚定立场也使西方传媒惊呼:中国的“惊人之举”，“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阶段”。因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呆在会场里,而是离开表决机器,到会场外进行更多的活动,寻求打破僵局。

九名新候选人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几天之内,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纷纷登台亮相,竟达到9人之多,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在内,9名候选人的籍贯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

12月11日,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17轮投票,德奎利亚尔获得了10票赞成票，因无否决票当选联合国第5任秘书长。

中国在联合国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就由各大洲轮流出人担任。发展中国家候选人也可以和发达国家候选人一样,涉足联合国秘书长这一最高国际组织的最高职务，在此以前是很困难的,这应该说是中国的贡献。（据《华声》）

他们把席子铺在亭子里或亭旁草地上,为了怕空气不好,各人的席子铺得有相当距离。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据《毛泽东与山文化》）